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召开  
2018年7月9日至18日

## 发展合作论坛第六次双年度高级别会议摘要

### 秘书处的说明

大会在第 67/290 号决议中决定了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形式和组织框架，并要求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考虑到发展合作论坛的工作。根据这项决议，秘书处谨向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交理事会主席编写的发展合作论坛第六次双年度高级别会议摘要。该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主题是“发展合作在实现《2030 年议程》方面的战略作用：建设可持续、抗灾能力强的社会”。会议发出了重要讯息，提出了具体政策指针，供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实际执行人员审议。



## 一. 引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发展合作论坛第六次双年度高级别会议。300 多名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的高层和高级代表出席了会议，以审查国际发展合作的趋势、进展和新出现的问题。所有区域的政府与知名专家、民间社会组织、地方政府、议员、慈善组织、国际组织、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进行了面向行动的讨论。
2. 会议有两个目标：(a) 评估在使发展合作适应《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发展筹资行动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b) 确定应开展何种行动，以确保发展合作有效促进建设可持续、抗灾能力强的社会。
3. 会议就发展合作在实现《2030 年议程》方面的战略作用发出了重要讯息，提出了具体政策指针，供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实际执行人员审议。与发展合作论坛有关的研究和讨论还将为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后续行动和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发展系统重新定位工作提供资讯。
4. 会议以为期两年的广泛筹备进程为基础，涉及分析工作、外联和各种活动，包括 2017 年在阿根廷举行的高级别专题讨论会和其他特别会议、会外活动和讲习班，以及发展合作论坛关于国际发展合作实效状况的调查活动。
5. 秘书长关于国际发展合作趋势和进展的报告(E/2018/55)为讨论确定了日程和基调。各区域国家赞扬报告以相当平衡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最相关的问题。
6. 与会者强调，发展合作可以发挥作用，帮助扭转不平等、冲突、气候变化以及暴力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消极趋势。尽管取得了进展，也出现了一些积极趋势，发展合作议程上的重大问题仍有待解决。发展合作论坛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总体讯息：要达到《2030 年议程》中确定的最后期限和预期，发展合作就需要以更大幅度、更快速度进行变革。
7. 各区域的国家利益攸关方大力重申，仍然需要发展合作论坛提供的独特空间，并确定了进一步工作的领域。

### 主要讯息

(一) 发展合作需要以更大幅度、更快速度进行变革，才能达到《2030 年议程》中确定的最后期限和预期。这种情况要求各级政策制定者和实际执行人员以包容各方的方式大胆地发挥领导作用，并及时采取行动，同时借鉴世界各地的新思想、新证据和新的研究成果。

(二) 发展合作必须做得更多，真正使政策和行动首先注重落在最后面者。它必须促进包容性，并把贯穿各领域的重点放在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将青年和其他边缘群体包容进来上。

(三) 回顾并重申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不足以给最贫困、最脆弱的国家和民众带来所需的变化，为此必须采取具体步骤，以：  
(a) 确保就官方发展援助作出的承诺得到履行；(b) 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处境特殊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c) 加强官方发展援助的有效分配和使用。这一点应立即做到。

(四) 发展合作必须更了解风险、对冲突更敏感、有更“聪明”的抗灾能力、与气候行动有更强的联系。孤立的短期方法注定不会成功。

(五) 发展合作应为参与手段带来创新和更聚焦的行动，使人们能有意义地参与发展进程和其他努力，不仅加强能力，而且增强对公共机构的信心。

(六) 发展合作应有助于抓住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包括在调动国家资源和建设国家统计能力方面的机遇，同时注意到风险，而且不扩大数字鸿沟。

(七) 应作为公共部门改革的一部分，优先制定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并使之与《2030 年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保持一致。有证据表明，此类政策可成为一个逐步从发展合作中取得更佳成果并提升伙伴关系质量的有力工具。

(八) 公私伙伴关系中的利益攸关者应以包容性和透明度原则以及现有能力、计划和交流为基础，并认识到此类伙伴关系的成效和影响因具体情况而异。必须紧急地加快分析工作和政策对话，探讨符合国家优先事项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混合融资，同时不扭转质量和成效方面的进展。

(九) 在《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纲领》通过四十周年之际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应重申南南合作的原则，强化其战略重点，把握当前的活力和创新，为所有利益攸关方推动一项具体的行动计划。发展合作论坛应作为分享知识和推动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全球政策对话的独特和可信空间为这一努力作出贡献。

(十) 必须大力加强对建设各国政府和其他行为体监测和审查发展合作的能力的支持，使其适应具体国情，并由定期审查为有关《2030 年议程》进展情况的自愿国别评估提供资讯。

(十一) 应加强发展合作论坛，使之成为区域间和多利益攸关方间有关对发展合作进行监测、审查和影响评估的学习平台，所有这些对实现和扩大可持续发展成果以产生更大效应的动力至关重要。

## 讨论摘要

8. 要达到《2030 年议程》中确定的最后期限和预期，发展合作就需要以更大幅度、更快速度进行变革。发展合作可有助于扭转不平等、冲突、气候变化以及暴力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消极趋势。这些趋势威胁到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它们增加了让广大公众支持《2030 年议程》并为实现这一《议程》争取

支持的困难。尽管在调整发展合作以使其适应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情况仍在不断变化。重大问题仍有待解决。在一个日益复杂多样的发展合作系统中，各行为体正努力尽快学会如何运作和取得成果。这种情况要求各级政策制定者和实际执行人员以包容各方的方式大胆发挥领导作用，并及时采取行动。

9. 本摘要涉及六个相互关联的行动领域：(a) 发展合作在实现《2030 年议程》、建设可持续的、抗灾能力强的社会以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方面的战略作用；(b) 加强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和办法、包括混合融资的成效和可持续发展影响；(c) 通过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取得更佳成果；(d) 弥合能力差距，促进战略领域的技术发展和转让；(e) 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f) 加强对发展合作的多层次监测、审查和评估。

## 二. 发展合作在实现《2030 年议程》、建设可持续的、抗灾能力强的社会以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方面的战略作用

10. 发展合作必须做得更多，确实首先注重落在最后面者。要使机构、政策和行动与《2030 年议程》的这一核心承诺保持一致，并变革性地注重成果，就需要作出更大努力，更多地进行实验、知识共享和相互学习。发展合作应更加系统地侧重资源最少、能力最弱的国家和人口群体。尽管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带来重大惠益，并非所有人都会平等地从中受益。

11. 发展合作必须促进包容性，并把贯穿各领域的重点放在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将青年和其他边缘群体包容进来上。它应支持采取全政府办法，为更有效地将性别平等和包容青年纳入政策制定、预算编制和提供服务的所有阶段提供新的动力。

12. 发展合作必须更了解风险、对冲突更敏感、有助于发展抗灾能力、与气候行动建立更强的联系，以建设可持续的、抗灾能力强的社会。这意味着在政策和行动中处理冲突、不稳定和贫穷之间的重要联系。也意味着采取真正综合性办法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特别向能力有限的国家提供更多量身定制的支持，以便从管理灾害转向管理和减少风险以及建设抗灾能力。这种支持应建立在现有国家能力和政策框架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加强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相关机构。各国政府应带头评估能力差距，确定需要国际行为体提供哪些支助。

13. 应进一步提高气候融资、特别是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融资的速度、可预测性和可获性。气候变化给各国政府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它们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以及灾后重建提供资金。鉴于发展中国家负债越来越重，在气候融资中普遍使用债务工具令人关切。还必须加强努力，避免重复计算，并保住作为《坎昆协议》一部分为气候融资承付的 1 000 亿美元，将其与其他官方发展援助承付款分开。

14. 国家分类、人均指标和平均指标不应作为评估融资需求和确定应否获得官方发展援助的基本办法。这些指标并不能充分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的进展，因

为它们没有反映持续存在的不平等和多层面贫困。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的关于从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毕业和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支持的辩论成为关注焦点，特别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最不发达国家基于收入达到了毕业门槛。

15. 发展伙伴必须把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和提高官方发展援助的成效作为优先事项，以达到《2030年议程》中确定的最后期限和预期。2017年，只有6个国家达到了联合国有关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0.7%的目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总数的比率从2016年的0.32%降至2017年的0.31%。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仍然远远落后于将国民总收入的0.15%至0.20%用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附带条件的援助的增加和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发展中国家有具体发言权的援助部分)的减少，都威胁到过去在使国际支助与国家优先事项以及国家自主权和领导权保持一致方面取得的进展。官方发展援助用于社会开支的比例下降也令人关切，特别是在能力有限的国家仍依赖官方发展援助资助其社会方案的情况下。

16.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必须采取具体步骤，以：确保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得到履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处境特殊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加强官方发展援助的有效分配和使用。官方发展援助尽管总体上在执行手段方面受限，但仍然至关重要，对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而且也是各种其他执行手段的催化剂。发展合作论坛因开展有效倡导工作、提请注意官方发展援助对实现《2030年议程》的独特和重要作用而受到肯定和称赞。

17. 发展合作应有助于就“参与手段”采取创新和聚焦行动，使人们有意义地参与发展进程和其他努力，以加强能力并增强对公共机构的信心。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在实地越来越多地以更加协作和迭代的方式出现。与此同时，全球不同的社会运动展示了个人可如何通过将个人故事与事实结合在一起，为变革释放强大的动力。促进《2030年议程》的发展合作应考虑如何利用这些强大的潮流，特别是在地方一级，尤其是在青年中间。

### 三. 加强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和做法、包括混合融资的成效和可持续发展影响

18. 应接受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和做法，以此作为取得更好、更可持续发展成果并把包容性提高到新水平的途径。民间社会组织、学术界和私营部门拥有无穷无尽的知识，可将发展合作转变为更大的变革平台。伙伴关系可有助于以互补的方式调动不同的行为体和执行手段。它们可以帮助以集体和协作的方式，为复杂的问题(例如跨部门、跨界、或跨代性质的问题)制定包容、综合和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19. 公私伙伴关系中的利益攸关者应以包容性和透明度原则以及现有国家和地方能力、计划和交流为基础，并认识到此类伙伴关系的成效和影响因具体情况而异。伙伴关系应支持能力建设，促进技术和想法、而不仅仅是财政资源的分享。各利益攸关方和受益方的预期和目标从一开始就需要透明，并得到理解。确定对

的伙伴——彼此拥有共同目标并愿意共同推进议程的盟友——至关重要。没有一个框架可以涵盖所有形式的伙伴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指导原则可以帮助管理不同的目标和预期，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目标和预期。应构建一个以有利的政治环境为后盾的软对话基础设施，使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是边缘群体能够积极和有意义地参与。

20. 要大幅增加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金融投资以及创新、能力建设、技术发展和转让，必须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不应该错过利用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投资者 220 亿美元资产的机遇，这些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除了考虑财务回报之外，还会考虑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21. 政府若依赖私营部门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则必须履行责任，确保此类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适当性。特别是在公共产品不能盈利的领域，公共投资仍然至关重要。

22. 在能力有限的国家，发展合作应支持政府建立有利环境，最大限度地扩大混合融资项目对非金融发展的影响。在没有坚实的法律或监管框架和透明的财政核算的情况下，促进公私伙伴关系和投资协议会带来风险，特别是对所涉民众而言。

23. 随着混合融资使用的增加，发展伙伴应采取紧急步骤，确保优惠融资不会被从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处境特殊的国家或从社会部门转走。2017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只有 2% 流向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地将官方发展援助用于混合融资也有可能使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和预算支助份额减少，附带条件的援助增加。

24. 必须迅速加快有关混合融资的分析工作和政策对话，这种混合融资应符合国家优先事项并带来可持续发展，同时不扭转质量和成效方面的成果。当公共资金被用来撬动私人融资时，应针对技术转让、就业和创收、与国内生产链的联系及避免垄断做法等问题，明确确定参数。在混合融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方面，包括对妇女和边缘群体及弱势群体的影响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数据空白。还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公平分担混合融资的风险和惠益，包括以这样一种方式构建混合融资交易，即如果一项投资进展良好，则以一部分回报来补偿“第一损失担保”的公共提供者。

25. 在利用官方发展援助撬动私人融资时，发展行为体必须确保尊重国家自主权和其他有效发展合作原则。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决定官方发展援助是否和如何用于混合融资。提供私营部门融资的实体所使用的成果框架应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的记录和管理融资的制度相适合。在方案和项目的所有阶段，让政府参与，并对国内利益攸关方和受益方进行高质量的公开意见征询，可有助于确保国家自主权和领导力，确保与国家需求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确保透明度和成果问责制。

#### 四. 通过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取得更佳成果

26. 各国应利用国家发展合作政策，作为确保基础广泛的国家自主权和逐步提升伙伴关系质量的有力工具。此类政策阐明了一国在动员发展合作以支持其国家努

力方面的愿景、优先事项、承诺和活动。发展合作论坛的调查显示，各国正在调整其国家发展合作政策的范围和实施，以更好地与国家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这些调整反映了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包括《2030年议程》和官方发展援助以外发展合作的多样化格局。一些国家还正在利用国家发展合作政策阐明本国的发展合作重点、其南南合作制度化的优先事项和相关的支助需求。

27. 应作为更广泛的公共部门改革的一部分出台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并使之与《2030年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保持一致。此类政策如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挂钩，则有助于加强机构、利用国家成果框架、实现政策与行动的连贯和协调。它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帮助克服发展合作中的权力不对称。国家发展合作政策要更有成效的话，就应包含外部伙伴、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政府各自的责任和具体行动目标。还应就其向公众以及国家和地方当局广为宣传。

28. 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和国内受益方都应参与国家发展合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进展审查，以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尽管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外部的政府和多边伙伴也有所参与，但仍需提高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慈善组织以及议会对国家发展合作政策进程的参与程度和质量。作为此类政策的一部分，应更加注重平等和将妇女、穷人和其他边缘群体包容进来。

29. 应定期对国家发展合作政策的执行进展情况进行多利益攸关方审查，或加强这一审查，以提升伙伴关系的质量和影响力。这些审查应向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有关《2030年议程》执行进展情况的自愿国别评估提供资讯。发展合作论坛的调查确定了在监测和审查国际发展合作方面加强对不同行为体能力支助的具体需求。这应成为联合国发展系统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以加强对国家一级政府调动《2030年议程》执行手段的支持。

## 五. 弥合能力差距，促进战略领域的技术发展和转让

30. 国内资源调动方面的能力支助应针对与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确定的国家收入水平相比差距最大的国家，并应对国家以下一级给予更多关注。支助不应注重加强税收制度，还应注重加强国家能力，为私人投资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深化国家和区域资本市场。在这方面，最不发达国家再次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为最不发达国家建立国际投资支助中心，并强调需要优化国内资源调动、援助、贸易、私人资本流入和债务减免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

31. 发展合作应对各国就国家预算和收入战略采取更为一体化的办法作出响应。这包括努力减少不同发展合作行为体所使用标准和系统的碎片化。利用国家系统，如信托基金和其他制度化平台，可以加强国家自主权和领导力，从而帮助提高不同项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确保可持续性和影响力。国内资源调动方面的政策咨询和能力建设不能只着眼于增加国内收入，还必须考虑到公平问题。

32. 必须增进投资和能力支助，以加强数据和统计能力，监测和审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实现《2030年议程》及其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需要在全世界、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提供高质量、准确、及时、公开

和充分分类的数据，并改进数据的传播和使用。支持加强国家统计系统并使之现代化的工作应遵循国家战略计划，并与《开普敦可持续发展数据全球行动计划》保持一致。这包括加强各国统计局和主管机构的技能和技术，注意收集和整合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包括地理空间信息与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的整合，以及加强它们参与创新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的能力。英才中心和其他区域间或区域内知识交流平台可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3. 国内数据的生成应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发展合作政策提供资讯。需要增强各国统计主管机构的权能，使其成为统计系统的核心，政策制定者需要确认数据对执行《2030 年议程》的重要性。为了充分利用新数据和传统数据，统计界必须与技术公司、全球数据提供者、研究人员和学术界、私营部门、慈善基金会和民间社会结成伙伴关系。在改进数据的可取得性、使用和分类方面，新的数据来源可提供一个重要视角，补充了传统视角。应开发新的业务模式和治理系统，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质量。

34. 应以第二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为平台，促进国家统计能力建设方面的投资和伙伴关系。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目前也正在考虑一项新的倡议，为执行《开普敦全球行动计划》建立一个筹资框架，重点是改进为高度分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编制工作进行的筹资，这些数据包括儿童、青年、残疾人、艾滋病毒感染者、老年人、土著人民、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移民等方面的数据。

35. 发展合作应有助于确保新技术和数字数据的获取能在金融普惠方面带来变革性变化，并改善对穷人服务的提供。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移动货币平台、与生计和健康问题相关的实时数据的获取，以及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人们的需求、机会和制约因素的其他数据。必须建立适当的监管和消费者保护制度，包括保护隐私的行为守则，以确保新的数据和技术机会服务于并保护穷人和边缘群体。

36. 最不发达国家应充分利用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的活动，支持其实现《2030 年议程》的努力。技术库的成立标志着发展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各国政府和其他行为体应提供有力和持续的技术和财政捐助，以确保技术库运作良好。尽管技术库应当在弥合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方面有所作为，但仍需解决创新能力、连通性和获得技术方面的不对称，以及发展中国家能力受限和缺乏适当技术基础设施的问题。

## 六. 利用南南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

37. 南南合作继续扩大，呈多样化且具有韧性。南南合作正在减少获得发展机会方面的不对称，并直接满足当地需求。南南合作正在迅速演变，不仅反映了发展合作的范围，还体现了行为体的多样性。南南合作的原则及其自愿和伙伴关系性质明确形成于 40 年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现在仍然是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8. 南南合作在使《2030 年议程》和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适合本地情况方面的重要性现在得到了更广泛的承认，但不应夸大。这方面的进展并不取代南北合作，



也不能取代在解决系统性问题方面加快取得的进展。南南合作日益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流，包括在发展援助委员会的一些国家和联合国系统支持下成为主流。论坛分享了从独立的发展合作机构到政府实体之间的协调机制等各种将国家一级的南南合作正规化的模式。

39. 应进一步提高南南和三方合作的可见度，进一步分析其附加值和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以帮助实现《2030年议程》。论坛与会者呼吁全球南方各国和行为体更加大胆地分享发展合作的经验和证据，呼吁全球北方更多地学习全球南方的经验，并在实践中融汇全球南方的经验和专长。这种努力应得到所有各级支持，包括通过发展合作论坛得到支持，因该论坛是分享南南和三方合作经验的独特和可信平台。

40. 南南合作对非金融合作和更广泛的伙伴关系层面的注重，应继续对扩大发展合作格局和后续落实《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产生影响。在多种办法和不同的区域动态和视角的基础上，南南和三方合作超越了金融合作。把重点放在包括能力建设、技术发展和转让、政策变革联合行动和多利益攸关方办法在内的不同执行手段上，扩大了贡献的规模、范围和灵活性，并促进关注长期影响。在推进发展合作论坛和第二届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筹备工作过程中，工业技术和金融服务应得到更多关注。

41. 三方合作的概念框架需要得到更新，以反映这些新的现实情况，而且必须制定新的方法来解决妨碍其有效利用的瓶颈问题。三方合作倡议正在将南南原则同时纳入项目或方案设计，强调相互学习、提供知识、分享经验和能力建设。有些人使用“三边”一词，以更好地反映这些伙伴关系的横向性质。三方或三边倡议直接促进南南方面的区域间合作和机构加强。

42. 多边开发银行可以而且应该在这一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在支持知识共享和知识管理网络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多边开发银行还可以支持进一步部署南南和三方合作，以此作为框架，推广最佳做法，促进开发、转让和调整采用负担得起的科学、技术和创新解决办法。

43. 应进一步编纂南南和三方合作方面的区域和国家经验，使之系统化，并将之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国家发展合作政策的主流。讨论揭示了不同区域的不同专门化领域，如非洲的机构和区域一体化、亚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社会政策转移和伙伴关系问责制框架。与会者一致认为需要将评价作为南南合作的经常做法，尽管发展中国家并不支持共同的评价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既不可行，也不可取。旨在实现系统化和制度化的不同区域办法正在出现，其中包括跟踪南南合作，这可能有助于扩大南南合作的规模和影响。有人特别指出，伊比利亚美洲加强南南合作方案长期以来就是各种最佳做法中的一个范例，这些最佳做法有助于产生基于成果的证据，并构成制定战略、技术和方法准则的基础。

44. 第二届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应重申南南合作原则，强化其对促进自主、抗灾能力和结构改革的战略注重，把握当前的活力和创新，为所有利益攸关方推动一项行动计划。会议及其筹备进程应被用来推动基础广泛、国家自主、包容各方的结构化合作，这种合作应切实符合《2030年议程》和其他国际商定

的发展目标。需要更多地交流如何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或三边合作中不同利益攸关方的相对优势，并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制定适用于它们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包括混合融资和与私营部门的互动协作。增加议员、地方当局、妇女、民间社会、青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将加强包容性、透明度、问责制和对成果的变革性注重。

## 七. 加强对发展合作的多层次监测、审查和评估

45. 鉴于发展合作办法和方法的多样化及伙伴和合作群体的多元性，对监测和评价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发展合作的起源和原则可能有所不同，但有关《2030年议程》的总体目标是相同的，而且得到了普遍认同：实现可持续发展成果，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46. 监测和审查机制需要继续发展，以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发展合作的复杂、多层次性质。相互问责和透明度需要反映发展行为体的多样性，并超越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国际发展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以便让各种行为体、利益攸关方和受益方参与进来。

47. 需要促进使用国家主导的综合发展合作成果框架和信息系统。近年来，在加强对发展合作的监测和审查方面取得了进展。国家一级正越来越多地建立国家主导的综合发展合作成果框架和信息系统，以评价和评估发展合作的质量和影响力，并辅之以多种区域框架和平台以及全球审查。不过，还需要在减少使用平行系统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48. 需要扩大对高质量数据、监测和评价的投资，以便从追踪投入转向实现发展成果。提高方案或项目设计的质量，建立基线和指标，对于加强发展合作努力的成效和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在监测和审查非金融合作的进展方面仍然存在挑战。

49. 必须大力加强对各国政府和其他行为体监测和审查发展合作的能力支助，并使之适合具体国情。加强区域间知识交流和相互学习也将有利于这方面的努力。必须采取实际步骤，加强议会在监测和评价发展合作成效方面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核准预算，包括使议员拥有开展监督活动的机构、财政和技术手段。

50. 应促进区域内发展合作机制和框架，以支持监测和审查进程，促进交流和相互学习。例如，非洲联盟成员国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联合国的支持下，正在通过联合活动和方案扩大同行审议机制，以在非洲联盟—联合国《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范围内同时涵盖《2030年议程》和《2063年议程》。

51. 全球南方的伙伴应发展国家主导的系统，来评价和评估各级南南和三方合作方案的质量和影响力，并改进数据收集、方法和统计。全球南方伙伴对自身做法的评估正在成形，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发展中国家应确定自己衡量南南合作的参数。

52. 需要进一步加强让私营部门参与发展合作的实例资料库。这应有助于促进知识共享和相互学习，了解如何使公私部门进一步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致。通过让私营部门参与项目成果的共同设计、执行和评估，私营部门可为建立数据驱动、透明和注重成果的监测和审查框架的努力注入宝贵的专门知识。

53. 应加强发展合作论坛，使之成为对发展合作进行监测、审查和影响力评估的区域间和多利益攸关方学习平台，所有这些都对实现和扩大可持续发展成果以产生更大影响至关重要。知识共享、相互学习和透明度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有助于提高认识、发现新出现的问题并促进各种监测和评价工具和办法以及同业交流群之间的相互交流。